

#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基础与内在张力

◇ 金民卿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完成好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在思考话语体系建构时,必须要考虑话语体系背后的思想内涵是什么,话语体系建构基于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话语体系反映的时代问题有哪些,我们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话语与思想、话语与文化、话语与时代、话语与生命力的关系,这与话语体系的建构基础和持久生命力密切相关。通过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科学建构一整套反映新思想深刻内涵、适应新时代实践要求、体现不同文化融通创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 一、话语与思想:话语体系建构的背后必然是深刻的思想建构

话语是思想的表现,思想是话语的内核。没有思想内涵的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概念游戏;而没有话语体系支撑的思想,也是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

一个完整的新型话语体系背后,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思想建构。黑格尔的《小逻辑》,从形式上看,就是由存在、本质、概念、质、量、度、实存、现象、现实、主观、客体、理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众多概念所构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这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同时也就是他所创立的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形式上看,是由商品、劳动、价值、使用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崭新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同时也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

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的《矛盾论》,也是由矛盾、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矛盾统一性、矛盾斗争性等一系列概念所构成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同时也就是毛泽东所创立的矛盾论哲学体系。这就是说,真正有价值的话语体系的背后,必然是深刻的、独立的思想建构。

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新思想的创建、形成和发展过程。一次重大的话语体系革命,也就是思想上的伟大革命或重大创新。马克思所实现的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就是以术语革命的形式来完成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这就是说,马克思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包含着话语体系、术语概念上的深刻变革,也就是建立了一套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术语完全不同全新的概念体系和术语系统。恩格斯的这个重大论断当然不限于经济学,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全部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理——通过术语革命,实现思想变革。

毛泽东也正是在提出一系列重要概念术语的过程中,创立和不断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他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时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

际相联系。”正是以这种独立的理论创造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思想建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标识性概念,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创造和制度创新。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和丰富过程,同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发展呼唤新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今,我们又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时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的新思想已经创立,这就需要建构适应和支撑新思想的话语体系,这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根本点所在。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有了新的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基础和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实际上是与创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进行的。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时,已经形成了重大的创新性思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鲜明地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概念,集中论述了新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并没有跟上党的理论创新的步伐。我们已经有了鲜活的实践经验,重大的思想创造,但是我们的学术理论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话语体系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在走依附发展的道路,很多理论都是西方引进来的理论体系和概念系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自主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或者还是停留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而没有形成承载新思想、支撑新思想、体现新思想、具有新时代特点的话语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

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 二、话语与文化:话语体系建构要通过不同文化资源的融通创新来实现

任何以思想为核心的话语体系,都是一种文化的积累,都是不同文化差异融合的结果。离开了长期深厚的文化积淀,要创建新的话语体系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谈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时就要考虑,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怎么样,如何把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有机组成。

弄清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首先就要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谈起。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政治再生和文化再生的双重任务。

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直落而下,传统的政治建构已经无法支撑中华民族再往前走。因此,政治制度和体制如何获得重生,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人们左冲右突,反复探路,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十月革命的感召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创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变革,并不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再生取得了重大成功。

另一方面,面临着内生性的文化再生的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支撑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为此,从鸦片战争

以后,人们千方百计地把传统意识形态同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拼接、嫁接、结合,力图以一种新的文化来支撑民族解放和复兴,但是一次次都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把基督教同中国的“大同”社会嫁接,洋务派把西方技术文化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嫁接,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启蒙思想和中国的“公羊”三世说嫁接,都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后,初建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夹击下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引进了一系列外来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格局,即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并存交织冲突的局面,新形态的中国文化建构并没有实现。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文化再生应该提到一个很靠前的位置,并且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融合,实际上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或逻辑推导的那样顺利。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意识形态地位,而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却依然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在特定期限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陷入了相互排斥的僵局。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相互排斥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表现的较为激烈。随着新的“西化论”的盛行,马、中、西三种文化甚至处于一种相互贬斥、相互否定的局面。研究传统文化的人看不起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外来的文化而不是中国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认为多数传统文化是糟粕,必须要彻底批判;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的人,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指斥为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需要的阶级斗争理论,另一方面则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腐朽落后的代表,要以所谓的西方先进文化取二者代之。三者之间的对垒,在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情况下,使得当代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并没有实现我们预想的目标。

由此,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等不同文化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了文化碰撞,呈现出马、中、西三种文化差异、冲

突、融合的特殊景观,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就必须要从这样的基本文化格局出发,分析当今时代中国不同文化的相互关系怎么样,它们之间的差异融合走到了什么程度,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融合发展,把不同文化的合理要素转化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明确思路,那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积极成果三种文化资源的融通创新。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这就是说,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是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和文化形态,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标识性概念;二是要充分发掘、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文化底蕴,夯实其深厚文化根基;三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使之不断获得中国化形态,真正融合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而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只有做好这三种文化资源的差异融合、融通创新,我们才能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 三、话语与时代:话语体系建立在对重大时代问题的深度把握之上

思想是时代的结晶。一个时代的思想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作为思想载体的话语自然要建立在在对时代的把握之上。时代在实践和理论上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就会形成一系列新的概念,这就是新话语产生的时代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当代性任务,就是要用新的

概念系统对新时代的重大时代之问做出学理上的概括、提炼和回答。

一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和阶段性特征,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加以概括。

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大的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人类历史发展“两个必然”的总趋势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矛盾必然造成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严重不合理。但是,这个大的历史时代在当前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力量正在明显下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它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急剧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大历史时期。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都用特有的理论话语,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做出过精准概括。对于当前的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运用中国智慧进行深度理论分析,用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加以概括,否则我们就只能沿用老祖宗的话语而落后于时代,或者照搬外来话语特别是西方话语而失去理论自主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刻把握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给予回答。

当今时代本质及其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时代问题:当今人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怎么样,人类面临着什么样的共同问题,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20世纪末的严重挫折后,能否在21世纪走出低谷、走向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带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展示出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并引领人类的未来

发展,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当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刻内涵、主要矛盾、重大问题、历史使命是什么,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中继续走向新的辉煌,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当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随着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长期而复杂,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得住风险考验,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对于这些重大时代之问作出深度的哲学思考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形成了一系列包含着中国智慧的标识性概念和重大理论判断。关于当代人类发展问题,他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观,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内涵的新安全观,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新局面,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他提出了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和逻辑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展现更加光明的前景,等等。关于当代中国发展,他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他提出了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使命,自我革命、从严治党是党的鲜明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判断、重要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当代中国理论的最高水平。

哲学社会科学界要认真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重复和形式化宣传的层次上,而必须不断提升理论创新的思想自觉和责任担当,深化对新思想的学理性研究,进一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丰富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形成新的标识性概念和创新性理论观点,不断丰富和充实新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些重大社会思潮,用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作出回应。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内思想文化日益活跃,全球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激荡、相互交锋,各种社会思潮竞相迸发,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一元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同多样性的各种社会思潮并存交织的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

除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导向,这些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积极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例如科研机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等。二是简单肤浅地重复党的理论,不加分析地维护现实,简单粗暴地压制针对当代中国的批评性观点,甚至不允许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例如某些学者以“正统”自居,动辄对其他学者进行简单化的批评甚至扣帽子式的指责。三是

在维护和支持现存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清醒冷静地、有限度地批评现实的不足,促进其发展进步,绝大多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况。四是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民主化、大众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趋势,较少地涉及或者尽可能回避意识形态争论,例如某些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八卦新闻等。五是站在特定政治立场或为某些敌对势力张目,谋求破解、攻击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主导文化,引起中国的颠覆性变革,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宪政论”“公民社会论”等一些非(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重大社会思潮,不论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赞同还是不赞同,批判还是不批判,它都是客观存在的。

面对这些重大社会思潮,哲学社会科学界当然不能回避和漠视,而必须要正视和回应。对于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人们总是要做出回答,批判它或者赞扬它、鼓励它或者限制它,总是要有态度的,回避是一个人的选择,但不可能是整个思想界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明显错误甚至反动倾向的社会思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不能作壁上观,做爱惜羽毛的“绅士”。

但是,即便是对于这些重大的错误思潮,我们也不能仅是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而必须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刻的思想理论分析,尤其是要针对这些错误思潮的特定话语和理论框架,提出有针对性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作为立论和批判的依据,掌握思潮争论和学术批判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缺乏顶层设计和战略意义的“还击”,或者只是政治正确而深度有限的反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马克思正是通过创立了建立新世界观才真正彻底地批判和克服了旧哲学,正是通过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才真正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庸俗经济学,正是通过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真正彻底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

#### 四、话语及其生命力:话语体系的持久生命力来自于其内在张力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定要

考虑到话语体系建构起来之后的深度解释力和持久生命力问题。正如任何事物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一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持久生命力也主要来自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张力,如果一种理论和话语体系缺乏促进自身发展的内在张力,那就只能是短期的、没有前途的。为此,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时,必须思考这种话语体系的内在张力。

首先,必须考虑话语体系的理论完整性和实践指向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必须要符合学术理论的发展规律,满足逻辑自洽的要求,有助于实现理论的严密性、系统性,这是理论话语向内的理论完整性追求。另一方面,我们所建构的理论和概念,必须能够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影响他人、影响世界,有助于为解决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这是理论话语向外的实践指向性要求。如果建构的理论自身的逻辑不自洽,那么这个话语就不符合学术、不符合理论;如果建构的理论对外在世界没有影响力,那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对立的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在特质和发展动力。

其次,必须考虑话语体系的人类普遍性和民族具体性的关系。学术或者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真正反映客观世界的真理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但是,每一个建构者都是有地域性的,都是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做到把人类普遍性的指向同民族具体性的立足点有机结合起来,是需要有理论智慧的。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时,我们必须站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推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正确处理普适性文明与制度性要求、民族性文化与全人类共识的关系;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充分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个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反映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最后,必须考虑话语体系的历史开放性和真理体系性的关系。我们既要考虑到话语体系本身的完整性,同时必须考虑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开放性,切实把这二者协调起来,形成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我们要站在人类认识的制高点上,充分吸收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实践的最新成果,深刻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建构一种自身贯通、内在关联的话语体系,形成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科学真理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成封闭的最终真理体系,要始终保持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性,追随人类文明和时代进步的步伐,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创立新的话语和思想丰富自身,不断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当代化”。

总之,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时,必须处理好理论完整性和实践指向性、人类普遍性和民族具体性、真理体系性和历史开放性的关系。决不能只强调立足自身而闭眼不看世界,这就是画地为牢;或者仅仅强调坚守体系而忘记了开放发展,这就是教条主义;或者只强调理论的完整而放弃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这就陷入马克思所讲的只是解释世界甚至连世界都解释不了的境地。

作者简介:金民卿,河南洛阳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